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文化通讯

2014年第6期
（总第23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意见
动态关注
■文化部发布2013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
■北京市委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媒体聚焦
■张艺谋《归来》热映　原著改编惹争议（待续）
■琼瑶怒告于正抄袭　知识产权保护成焦点
尖峰观点
■吴　军：大城市发展新行动战略：消费城市
■龙海波：城市人口流动管理的几点思考
海外视野
■巴黎：让市民觉得城市拥挤的不是城市密度
研究院之声
■我院召开“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学术研讨会
■我院重大项目成果《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出版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节选)

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在当代中国，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识，我们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

广大青年树立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以下几点上下功夫。一是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知识是树立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形成自己的见解，既要专攻博览，又要关心国家、关心人民、关心世界，学会担当社会责任。二是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修德，既要立意高远，又要立足平实。要立志报效祖国、服务人民，这是大德，养大德者方可成大业。同时，还得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三是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做出正确判断、做出正确选择。四是要笃实，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据新华网，2014 年 5 月 5 日）

■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意见

为全面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贯穿到首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使之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发挥全国文化中心的示范引领作用，北京市委提出如下实施

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

二、强化首善意识，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首都经济社会政策制定和重大改革。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到首都社会治理全过程；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彻到首都法治建设中。

三、注重立德树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首都国民教育全过程。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规划、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拓展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完善教师任职资格准入制度，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和评价的首要内容，与职称晋升和评优奖励挂钩，实行师德一票否决制。

四、加大宣传教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首都共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把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梦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坚定人们的价值追求；发挥新闻媒体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传播；创作生产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秀文化产品；发挥公益广告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

五、注重实践养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北京人的良好形象；以思想道德引领战略推动全社会道德实践；以志愿服务为抓手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深化首都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滋养作用；发挥重要节庆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优势。

六、加强组织领导，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建立党委政府负总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党员、干部要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楷模；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任务落实到基层。

（据《北京日报》，2014 年 5 月 27 日）

■ 文化部公布《国家艺术基金章程（试行）》

4 月 30 日，文化部公布《国家艺术基金章程（试行）》，该《章程》自 5 月 1 日起施行。根据章程规定，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是国家艺术基金的决策机构，受文化部、财政部领导和监督。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基金管理和组织实施。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承担咨询、评审、监督等相关职责。

国家艺术基金面向社会，国有或民营、单位或个人，均可按申报条件申请基金资助。章程规定，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范围包括艺术的创作生产、传播交流推广、征集收藏、人才培养等方面。项目资助立足示范性、导向性，努力体现国家艺术水准。资助方式分为三类：项目资助，即根据项目申报类别及评审情况予以相应资助；优秀奖励，即对优秀作品、杰出人才进行表彰与奖励；匹配资助，即为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支持艺术

发展，对获得其他社会资助的项目进行有限陪同资助。

章程规定，申报单位及个人依据申报指南载明的条件与要求确定申报项目并填报项目申报表，按申报指南规定的时间和程序进行申报。管理中心应当自基金项目资助申请截止之日起30日内，完成对申报项目的审查。符合基金章程和年度项目指南规定的，予以受理；不符合的，通知申报主体不予受理。申报主体对不予资助决定有异议的，可自公示之日起15日内，向管理中心提出书面意见。管理中心对申报主体提出的书面意见，应自收到之日起60日内完成审查。

（据新华网，2014年5月2日）

(2)政策解读

■ 蔡武：国家艺术基金要把钱花在刀刃上

国家艺术基金是时代的产物，改革的产物，因此，它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一定要反映时代的需要，适应改革的要求。对于不同所有制的艺术机构，要坚持机会平等、一视同仁；对于发展方向正确而薄弱的艺术领域，要予以支持；对有创新潜力和能力的、以个人为主体的艺术创作和艺术工作室，要予以扶持；特别是对于青年艺术人才、原创艺术项目、新兴艺术门类，更要予以密切关注。同时，作为国家基金，一定要坚持高标准、高水平、严要求，要起点公平、机会公平，门要开得大但门槛要高，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示范、引导作用，推出更多的名家、名作。基金工作要有前瞻性，要有长远眼光，善于发现人才，要关注不那么有名但富于才华、活力和责任感，潜心创作、埋头苦干的艺术工作者，为他们施展艺术才华、艺术抱负提供更多的机会，创造更好的条件。

我们将通过制度设计来保证专家评审的公正、公平。初评采取网上通信评审形式，按地域回避、双向匿名的要求进行评审。我们还设计了对初评、复评专家进行监督的程序，由信息网络平台自动给出比较客观“偏离值”评价，为动态管理专家库提供参考，确保评审资助活动科学规范、公平公正。此外，将基金的运作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不断扩大社会参与度，也有助于提升政府管理部门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目前我们有三种主要资助方式，即项目资助、优秀奖励、匹配资助。三种方式有资金侧重，主要是对不同的类别采取不一样的资助。比如，大型舞台剧，个人美术书法摄影，人才培养等，这些适用于项目资助。小型舞台剧，适用于优秀奖励。传播交流推广，适用于匹配资助。基金努力的方向是力求为每一种艺术形式寻找适合的资助方式。

对已有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国家艺术基金应避免重复资助。坚持公益性，对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艺术传播交流推广活动，基金不介入，以避免干扰和扭曲市场信号。基金要争取精确地确定资助的重点和环节，力求把有限的资金花在刀刃上，花出效益，花出影响，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不断改善优化艺术发展生态。

（据《人民日报》，2014年5月7日）

■ 陶东风：弘扬传统文化与继承五四精神：核心价值观建设不可或缺的两翼

在今年2月举办的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习近平就文化建设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涉及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特别是传统文化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关系、本土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等问题，应该是我们当前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首先，真正有生命力的传统文化一定是活在当下的，是一种在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仍然被践行、被奉行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传统才是活生生的传统。也正因为这样，传统文化和当代生活必须是吻合的，必须具有当代性和开放性。对传统文化不能持一种抱残守缺的保守态度(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的原则也适合文化)。“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要紧密结合，脱离时代特色是没有生命力的。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思想中哪些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加以剔除；哪些和当代生活虽然原则上不冲突，但需要经过重新阐释。

其次，要处理好本土性和普遍性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包容性的体系，既有本土性，又有开放性，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而且其中很多内容是具有普遍性的。在思考和认识传统文化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时，要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儒家价值观、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是对立的，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排斥儒家文化的。另一种是认为儒家价值观可以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两者是完全相同的，甚至在表述上也要用“仁”“义”“礼”“智”“信”取代现在的表述。

最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价值观必须与“五四”以来的现代启蒙文化、启蒙价值观形成良性的互补关系。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当时语境的关系，“五四”时期的反传统的确有其偏激之处，对其进行适当反思是可以的。但是由此而完全否定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化，甚至认为鲁迅等人是被西方文化洗脑和殖民了，这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习近平总书记5月4日在北大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列举的这些五四精神或五四价值观，至今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既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继承“五四”精神，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两翼，缺一不可。为此，我们必须深入研究传统文化的构成，认识传统文化的复杂性，与此同时，也要深入分析五四精神的构成，认识五四启蒙主义的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具有共性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相融合的、在当下和今后仍然具有合理性与普遍性的元素，在更高的层次上建构我们今天的核心价值观。

（据作者新浪博客，2014年5月5日）

2. 动态关注

■ 文化部发布 2013 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

为进一步向国内外全面客观展示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成就，充分发挥统计数据客观性、简洁性、权威性特点，近日，文化部首次正式公开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2013 年文化发展统计公报》(以下简称《公报》)。

《公报》分为机构和人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艺术创作演出、文化产业与文化科技、文化市场、文化遗产保护、对外及对港澳台文化交流和文化资金投入等八个章节，基本涵盖了文化系统职能范围内的所有领域。数据既选取了现行全国文化文物统计年报中的部分核心数据，同时也充分采用了文化部各业务司局的行政管理记录以及国家统计局、财政部等部门正式公开发布的数据，力求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当前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全貌，为社会各界了解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情况提供重要参考。

《公报》显示，截至 2013 年年底，全国文化系统所属及管理的文化单位共有 29.30 万个，从业人员 215.99 万人。公共图书馆 3112 个，全年总流通人次 49232 万，比上年增长 13.3%；群众文化机构 44260 个，全年组织各类活动 129.32 万场次，比上年增长 6.8%；艺术表演团体 8180 个，全年演出 165.11 万场，比上年增长 22.3%；博物馆 3476 个，全年接待观众 63777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3.1%。2013 年全国文化事业费 530.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重为 0.38%，与上年基本持平。

（据文化部网站，2014 年 5 月 16 日）

■ 北京市委成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

5 月 7 日下午，北京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由郭金龙任组长，王安顺任副组长。

会议指出，北京作为我国的“网都”，网络资源丰富，知名网站云集，信息化程度高，在国家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理顺体制机制，全面整合资源，加强统筹协调，确保本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整体推进、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决定，成立市委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作为市委常设议事协调机构，受市委常委会领导。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贯彻落实中央的重大战略、决策、规划、部署和工作要求，组织领导本市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制定发展规划、政策，推进法治建设，统筹协调、研究解决涉及本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

（据《北京日报》，2014 年 5 月 8 日）

■ 2014 京津冀协同发展研讨会在京召开

5 月 29 日，北京市社科联、天津市社科联、河北省社科联在京共同组织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研讨会。来自三地及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一百余人参加了研讨会。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崔耀中代表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伟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祝贺。崔耀中在致辞中指出："北京的发展离不开京津冀的协同发展。要解决北京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根本的出路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希望三地立足各自的比较优势，立足现代产业分工要求，立足区域优势互补原则，立足合作共赢的理念，以京津冀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以资源要素空间统筹规划利用为主线，以构建长效体制机制为抓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快发展。"会上，北京市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凯，天津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张博颖，河北省社科联常务副主席曹保刚先后致辞，他们共同希望三地的专家学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加强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研究、交流。

在研讨会中，与会人员分别就京津冀区域产业对接协作、京津冀区域规划与协同战略和京津冀生态、科技、文化合作与新兴城镇化等主题进行深入对话交流，共同探讨新形势下三地合作发展的新机遇、新领域、新对策和新机制，为全面推动三地在经贸、能源、金融、科技、生态、人文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建言献策。

（据北京市社科联网站，2014 年 6 月 6 日）

■ 文化部提出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构想

近日，文化部提出以文化先行方式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打造，通过文化经贸加强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

据了解，这一构想计划从五个方面展开：一、定期举办"高峰论坛"。由政府部门、丝绸之路沿线各省市、中亚五国、相关文化企业等一起，每年定期举办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发展高峰论坛，共同探讨多边文化经贸发展规划、文化项目合作、文化交流活动等议题。二、大力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结合丝绸之路辐射范围内的优势文化产业资源，通过发展文化产品和服务国际电子商务平台、国际文化贸易展交中心，举办文艺交流活动，开展影视剧、动漫项目国际合作，互设文化贸易中心、建设国际营销网络等方式推动文化对外贸易发展。三、文化产业融合推动相关产业发展。结合丝绸之路辐射区内的文化产业特色，通过发展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亚文化与建筑设计、工业制造、影视制作、文化旅游相融合，提升文化作品的科技含量，打造有特色、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和产品，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推动多产业融合发展，带动西部产业升级、改革。四、深度结合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规划。"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覆盖区域正属于"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中国部分的核心区域，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作为"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规划的一部分，加强政策和规划的顶层设计，实现资源有效利用、

协调统筹发展。五、制定切实可行的支持政策。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制订出台专门的支持政策，利用现有园区基地，在丝绸之路重要省市建设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基地或园区，在现有的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政策基础上，制定针对民族文化、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特色文化产业、对外贸易等的具体支持政策。

（据新华网，2014 年 5 月 7 日）

■ 四部门要求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门联合出台指导意见，要求切实加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

传统村落不仅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还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然而，在过去几十年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传统村落大量消失，现存数量仅占全国行政村总数的 1.9%。与此同时，传统村落遭到破坏的状况日益严峻。根据指导意见，四部门提出，用 3 年时间，使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文化遗产得到基本保护，具备基本的生产生活条件、基本的防灾安全保障、基本的保护管理机制，逐步增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综合能力。中央财政将统筹农村环境保护、“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及美丽乡村建设、国家重点文物保护、中央补助地方文化体育与传媒事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专项资金，分年度支持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另外，传统村落认定不搞“终身制”，建立退出机制。

（据新华网，2014 年 5 月 1 日）

■ 第 21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闭幕

第 21 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 5 月 10 日晚在国家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活动共吸引国内二十多所高校数千名大学生观众和两百多位电影人参加。曹保平导演的《狗 13》成为“黑马”，获得最佳影片大奖。张家辉、汤唯分别凭借《激战》和《北京遇上西雅图》获得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

这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气息十足，颁奖典礼不仅由大学生担任主持，年轻歌手胡夏、郁可唯还演唱了串烧歌曲《时间煮雨》、《致青春》、《同桌的你》等。本届电影节共有 34 部影片入围，由电影学者和大学生组成的评委共同从中评选出各大奖项。此外，本届电影节组委会大奖颁给了已去世导演吴天明的遗作《百鸟朝凤》以及高晓松监制的青春怀旧片《同桌的你》。

（据《北京日报》，2014 年 5 月 11 日）

■ 第十届深圳文博会开幕

5 月 15 日，由文化部、商务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贸促会、广东省政府和深圳市政府主办的第十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开幕。

深圳文博会创办于 2004 年 11 月，以展出“文化 + 科技”“文化 + 创意”“文化 + 旅

游”等产业融合成果为特色，经过9届发展，逐渐成长为影响力和品牌价值兼具的中国文化产业展会品牌。10年来，深圳文博会成交额节节攀升，从首届的357亿元到第九届的1665亿元，9届总成交额已突破8000亿元；分会场个数从1个发展到54个；文化产品出口交易额已累计超过850亿元。据了解，本届深圳文博会吸引了95个国家和地区的1.7万名海外采购商，“中国文化产业第一展”的品牌影响力逐渐增强。

（据文化部网站，2014年5月16日）

■ 作家阎连科获得卡夫卡文学奖

近日，著名作家阎连科获得2014年度弗兰茨·卡夫卡奖。这是中国作家首次获此奖项，也是继2006年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之后，亚洲作家第二次获此殊荣。

被国内文学界誉为“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的阎连科，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和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应征入伍后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专业作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曾多次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中国文学奖项。代表作品有《日光流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四书》等，作品被译成法、英、德、日、韩、西班牙、挪威、丹麦、蒙古等20多种语言。2013年他入列“英国布克国际文学奖短名单”。

卡夫卡文学奖创立于2001年，为纪念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卡夫卡而设，每年评选一次，主要颁给那些作品具人文主义关怀的作家，获奖者不存在国界限制。

（据新华网，2014年5月29日）

3. 媒体聚焦

■ 张艺谋《归来》热映原著改编惹争议（待续）

编者按：5月16日，影片《归来》上映，该片由张艺谋执导、改编自严歌苓小说《陆犯焉识》。随着票房收入的不断攀升，有关该片改编成败得失的争论也成为各大媒体的关注焦点。这些争论不仅涉及忠实原著度、艺术表现力等问题，还深入到灾后精神重建、心理创伤及修复等公共问题。

有人认为，文学作品改编一直是张艺谋的创作来源，现在却也成为他的短板。尽管《归来》堪称近年来导演本人及国内影坛的水准之作——叙事平实而流畅，镜头讲究，表演细腻，情感真挚，令无数观众感动到潸然泪下，可是从文学改编的角度来说，它却绝对算不上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因为除了主角的名字及少许情节，《归来》和《陆犯焉识》基本毫无关系（据崔巍：《〈归来〉改编的舍本逐末》，《北京青年报》，2014年5月22日）。

电影把重点设置在归来以后，对于归来以前和归来的过程删除几尽。但即使归来以

后，电影仍然放弃了小说的故事发展，另起炉灶，却在故事创造上表现出了想象力的缺失与单调。电影固然可以为了避开政治禁区，舍弃政治运动的残酷和荒诞，却不可以同时舍弃一个作为灵魂的丰满人物。影片或许可以解释为以一个更普通的人物使更广泛的人群产生共鸣，但试问一个牺牲掉个性以求浮泛地象征众生的人物又如何爆发出强劲的震撼力呢？（据徐鹏远：《艺谋归来，焉识丢了》，凤凰网，2014 年 5 月 23 日）

相识/相忘的拉锯式情节填塞 80 分钟的时间长度，故事似乎演变成一位男性对女性漫长而徒劳的记忆拯救。影片复述了中国古典诗词中“旧人不覆，良人未归”的感伤意象，也可视为用东方形象精心装扮而成的西方原型故事，堪称中国版的《奥德赛》（据聂伟：《讨论心灵灾难后精神重建》，《解放日报》，2014 年 5 月 23 日）。张艺谋的《归来》，一言以蔽之，那些敏感的年代只能通过陆焉识逃跑回来的一段戏来表达，而这一段恰恰是本片最好的一段。抽离了历史过往和人物性格经历的铺垫，始终无法触动到泪点。没了荒谬的世态炎凉和 20 年的一家离散，这部所谓史诗也就只剩下“如何谈好一场黄昏恋”了（据史玉琨：《张艺谋的一半归来和一半散漫》，今视网，2014 年 5 月 29 日）。

当然，《归来》在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中尖锐地提出了“文革”灾难的心理后遗症问题，为文艺反映历史创伤提供了一个与其他“文革”题材小说不同的切入点（这点在小说《陆犯焉识》中本来也有，但是被电影强化了）。《归来》重视了以爱情表象呈现的那些无法言说、迄今仍在隐隐作痛的历史秘密。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它以“心因性失忆”这个革命后遗症为切口进入历史，使得被大历史忽视的具体个体的心理和情感秘密得以重现。但问题在于，由于留下了太多当时政治生态方面的空白，因此，通过观看电影，观众很难了解主人公的精神创伤由何而来（据陶东风：《从政治悲剧到人性绝唱——〈归来〉对〈陆犯焉识〉的去政治化、去历史化改编》，作者博客，2014 年 5 月 31 日）。

■ 琼瑶怒告于正抄袭　知识产权保护成焦点

编者按：5 月 15 日，《花非花雾非雾》官方微博发布《琼瑶写给广电总局的一封公开信》，控诉于正新剧《宫锁连城》抄袭《梅花烙》，致使琼瑶正在创作的新剧《梅花烙传奇》因此停摆，并要求湖南卫视停播《宫锁连城》。

有人提出，目前法律在著作权的保护中，只保护表现形式，不保护中心思想。所谓表现形式，就是在文字上对于事件的描述；而中心思想则包括故事的情节设置、框架搭建等。因此，虽然琼瑶表示于正的《宫 3》的主角设置、主角关系、支线任务设置都与其《梅花烙》如出一辙，但这些都属于中心思想层面，所以不能构成侵权。虽然从法律上不构成侵权，但在道德层面上是必须对任何抄袭行为进行声讨的。（据《律师：于正不构成侵权，只能道德谴责》，《现代快报》，2014 年 4 月 16 日）。编剧行业中的抄袭和模仿性质不同，前者被法律禁止，后者则被允许。如何界定抄袭和模仿，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在同一题材编剧中，后剧对前剧情节、主题、背景等素材的模仿，在实践中都

不被认定为抄袭(据章苒、段菁菁:《琼瑶举报于正抄袭,知识产权保护成焦点》,新华网,2014 年 4 月 16 日)。

有律师建议,琼瑶如果以改编权被侵权来起诉于正的话,胜算会大一些。改编权是著作权法中的一项权利,改编属于新的创作形式,也就是在原有作品基础上,对原作品的表达形式做相应加工。如果是改编权被侵犯,就不能以演员的台词是否雷同来判断,而需要从《宫锁连城》和《梅花烙》的故事情节等多个方面进行比对(据《琼瑶亮剑,怒告于正》,《钱江晚报》,2014 年 5 月 28 日)。

一方面,界定是否侵犯著作权确实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走法律途径不一定十分有效;另一方面,这其实更是行业规范和业内道德问题。事实上,在如何保护编剧的知识产权方面,美国、韩国等影视产业发达的国家已经有了成熟经验。例如美国等国家的"诉前禁令"即能保护编剧权益。"诉前禁令"规定,只要维权者有足够证据并提供一定保证金,法院就可以下达禁令,阻止涉嫌剽窃作品的一切发行渠道。这让剽窃的违法成本变得很高(据章苒、段菁菁:《琼瑶举报于正抄袭,知识产权保护成焦点》,新华网,2014 年 4 月 16 日)。

4. 尖峰观点

■ 吴军:大城市发展新行动战略:消费城市

随着城市结构的转型,类似公司和社团这样的组织会变得更加具有流动性,而大都市的增长会越来越依靠作为消费中心的城市功能与定位。与底特律这些城市的衰竭刚好相反,芝加哥作为工业城市转型成功的"优等生",得益于城市舒适性和便利性的塑造。上世纪中后期,芝加哥市长推行了强有力的城市改造项目,兴建与更新大批的城市设施,以及开展多样性的文化交流,举办大型的国际赛事与活动。现在的芝加哥完全是一个以消费娱乐休闲为主的城市。哈佛大学城市经济学家格莱泽认为,最近十几年,纽约城市租金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工资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城市作为生活场景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原因在于更多高素质人才聚集纽约,推高了租房的刚性需求,从而推高了租金价格。租金上涨速率大于收入上涨速率,意味着更多的人迁入纽约,不是为了参与劳动生产,而是为了体验与消费。因此,对生活质量的强调、对城市舒适性与便利性的塑造,将成为未来大城市建设的新行动战略。

未来大城市的优势体现在城市作为消费机器的能力上,而舒适性和便利性正是这种能力的重要体现。第一,丰富多样的服务与消费品。一些具有地方特点的餐馆、剧院、酒吧以及文化活动等借助于新兴传播手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传播。第二,美学与物理设置。毫无疑问,城市建筑能够增加城市魅力,这种魅力主要体现在它的外表与内在的便利上来(当然有的建筑也会追求舒适性)。除此之外,生态环境条件会影响城市的舒适

性。比如，气候好坏、空气质量等影响着城市的人口流动和租金变化。第三，好的公共服务。好的学校与低犯罪率也与城市增长有关。如果具有良好的教育资源，城市设施对于城市发展的好处将会呈几何效应。当然，好的公共服务不仅仅是指教育资源，还包括健全的医疗、社会保障和社区服务等。第四，城市设施还包括速度。在某种意义上，在大都市区域，人群所到之处便会产生服务与就业，而人们选择一些都市区域或者不选择一些都市区域，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是他们考虑的重要因素。格莱泽对纽约和波士顿的研究表明，城市边缘运动和就业的去中心化正在增加人们通勤的距离，但却减少通勤的时间。这种现象产生的关键因素就是速度。

（据吴军：《大城市发展新行动战略：消费城市》，《学术界》，2014 年 2 月）

■ 龙海波：城市人口流动管理的几点思考

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在于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它包括原城镇居民和外来人口两个层面。

第一，要坚持大城市管理与中小城市“拓围”并举。充分挖掘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的承载潜力，逐步拓宽其功能定位、市场渠道，形成与邻近中心城市相匹配的城市群、城市圈。

第二，要从控制人口规模转向提升人口质量。政府在限制外来人口的同时，必须提高本地人口的就业能力和质量，使之不断适应大城市的竞争压力，否则，就容易形成制度性的“自我保护”，通过城市福利补贴一部分可能被竞争淘汰的原城镇居民。因此，引导人口有序流动是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过程，既要通过吸引高端人才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也应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合理分流人口。

第三，要从解决人口就业转向产城融合发展。中小城市产业集聚区发展较为滞后，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相对不足，直接导致吸纳人口就业能力的低下。解决人口就业不仅是解决基本生计问题，还应不断提高工资待遇和公共福利，这些都要依赖产业的转型发展，不断提升产业高附加值和劳动者技能水平，逐渐实现产城融合发展。

要扭转人口单向集中涌入趋势，合理引导外来人口向中小城市、中心城镇转移，其管理举措不应局限于“户籍绑定”、“规模控制”，根本上还要从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入手，充分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动调控和地方政府间的联动参与作用，主要思路是：按照“机会均等、权益均衡”的目标，逐步引导人口向户籍地附近中小城市转移。重点发展中小城市和中心城镇，不断缩小各类城市功能差距，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此同时，要加强对大城市的宏观管理，通过管理创新和提高效率整合城市资源，使之形成人口数量与城市承载的合理匹配。

（据龙海波：《城市人口流动管理的几点思考与建议——新加坡、越南“结构转型与城镇化”调研启示》，《中国发展观察》，2014 年第 5 期）

■ 罗小茗：“广场舞”与“不打烊”书店

“广场舞”和“不打烊”书店，虽不是左右经济民生的大事，却是这座城市无法摆脱的烦心事，涉及当前城市对公共文化空间的改造。

想在被充分商品化了的城市空间里，就近找一处公开活动的场地，早已困难重重。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有二。其一，到目前为止，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忽略对公共空间的构想和设计。在这里，公共空间不仅指绿化景观、公用车库，更是指人们能够自由使用、进行公共活动的场所。这一忽略既由开发商自身利益决定，也因现有设计一味模仿西式社区，缺乏对中国人公共活动特性的思考而越发突出。其二，社区之外的城市公共空间，往往被派定为与社区生活相配套的商业、绿化和交通用途，政府的规划与责任，亦只限定在这几类用途之上。文化的用途，则不在此列。

实体书店的窘境，很大一部分也由此出现。若对小区周边的店铺做一个粗略的统计，其中十之五六是房产中介，十之三四是饭店、小超市、理发店，余下的可能是家居用品、宠物、服装、银行等。相比之下，在这一轮城市空间改造的过程中，实体书店网络的破坏与萎缩，被视为昂贵租金和网络冲击下的必然结果，成了无需讨论的“事实”。实际的生活空间越是不提供阅读路径的多项选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阅读习惯就越是脆弱，越是受制于压倒一切的互联网。阅读也就此沦为游荡在城市里的另一番乡愁。

至此，无论是“广场舞”还是“不打烊”书店，不过是人们追求公共文化生活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的出现意味着，在城市生活中，公共文化空间的改造、其与社区建设、日常生活的关系，是与交通、生活设施、商业和居住同等重要的议题；既需要政府负责的规划、认真的建设，也需要社会的共同争取与积极维护。要把握和建设今天的城市文化，首先需要面对的正是“广场舞”、“不打烊”书店这些在空间匮乏的现实处境中倔强生长起来的城市公共文化形态，仔细辨认和体会由此呈现的人们对公共文化生活的真实需求和现实焦虑。在这些鲜活但不无缺憾的城市文化形态中，既蕴藏着对城市公共文化展开自我理解和自我修正的重要线索，也孕育着重新定义“城市文化”的重大能量。

（据罗小茗：《“广场舞”与“不打烊”书店》，当代文化研究网站，2014 年 5 月 12 日）

■ 张慧瑜：“梦想”去哪儿——电视真人秀背后

对于生活在市场环境里的个体来说，从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变成光鲜亮丽的成功者似乎是每个人的宿命，诸如“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到彩虹”、“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等人生格言也是大众文化(流行音乐、影视剧等)最善于讲述的心灵鸡汤。80 年代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那种强调工业生产、革命斗争的工农兵文艺也转变为讲述个人奋斗、成功励志的大众文化。港台流行文化之所以能够抢得先机，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种文化恰好是一种与市场体制相匹配的文艺样式，直到 90 年代中国本土大众文化才开始全面兴起，90 年代初期热播的《北京人在纽约》也是最早讲述个人奋斗的美国梦故事。

如果说人人通过勤奋努力都能获得收获和成功是80年代先后开启的农村、城市改革的情感动力，那么90年代经历更加激进的市场化潮流，曾经在80年代改革中获益的农民、城市工人群体、进城农民工则迅速沦落为社会弱势群体，而小资、白领们与新富阶层成为新社会的中坚和主体，中国社会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阶级重组和分化。新世纪以来那种白手起家、个人奋斗的美国梦逐渐转变为有房有车有孩子的中产梦，一种从奴隶到将军、从底层到上层的阶级跃升转变为从低级到高级的科层制，这也正是2005年前后《杜拉拉升职记》等职场剧以及《超级女声》等晋级选秀节目得以流行的社会背景。科层制(又名官僚制)作为一种现代组织制度，在机关、公司中广泛应用，被认为是一种效率最高的管理方式。科层制并不实现阶级身份的逆袭，只是一种从白领到中产到金领的上升路线图。这种中产梦也是中国城市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出现的，只适用于城市白领群体，对于大量从事服务业以及制造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科层式的晋级制显然无法打破阶层的壁垒。

这种奋斗励志的职场故事没有流行多久，2010年前后，职场故事逐渐转变为谍战剧《潜伏》式的办公室政治以及后宫剧《甄嬛传》式的腹黑术，那种阳光下自由公平的竞争迅速变成黑夜里的勾心斗角和尔虞我诈，这与白领阶层近些年越来越艰难的生存压力以及失望情绪有关，也就是说成功并非来自于“正能量”，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腹黑和暗箱操作的结果。昔日作为中产阶级后备军的小资、白领在国际化大都市的资本空间中成为“高学历、低收入、难发展”的蚁族、屌丝，中国社会完成了第二轮阶级分化，这也为“屌丝的逆袭”提供了现实基础。根据百度百科对“逆袭”的解释，它是“形容本应该是失败的行为，却最终获得了成功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逆袭”的命名本身恰好印证出奋斗的失败和无法成功的绝望感，逆袭并不挑战黑暗世界的游戏规则，反而是对既定游戏规则的高度内在化，这就是逆袭的悖论之处，正因为无法逆袭成功，所以才要逆袭。

就在这种新世纪以来依然能够分享个人成功梦的白领阶层陷入屌丝化、无法逆袭的境遇之时，借助《星光大道》、《中国达人秀》等电视栏目的推动，涌现了一批身怀绝技、才艺的草根明星、草根达人，这些故事与其说向人们展示了一种逆袭成功的希望，不如说更加暴露了成功的偶然性和奇幻色彩，曾经的勤劳致富、公平竞争变成了一种赌博游戏和赌徒心态。这些其貌不扬、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依靠视频网站、电视选秀节目“一夜走红”的明星，如同中了彩票或者“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般成为这个时代的“幸运儿”，实现梦想再也不是普通人能够抵达的目标，而变成了一种人间“奇迹”。也许在越来越难以出现奇迹的时代，人们更愿意相信“奇迹”会发生。

（据张慧瑜：《“梦想”去哪儿——电视真人秀背后》，《南风窗》，2014年第9期）

■ 陈延斌 牛绍娜：欧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对我国的启示

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体现在概括和提炼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和手段上。在这方面，欧美一些国家的做法能够为我们带来以下启示。

发挥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上的主导作用。第一，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倡行力。通过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党委宣传部门和党报党刊等媒体，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输给广大人民群众，并以此来教化、感召和激励党员群众努力践行。第二，强化各级政府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文化主导力。各级政府都要秉持以人为本、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以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愿景，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扶持力度以充分发挥其传播助推作用。非政府组织是欧美国家社会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助推者，借助和利用其自由、广泛的优势是传播和渗透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路径。我国也存在着众多的非政府组织，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如组织能力弱、资金不足、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等，这就要求国家和政府加强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调控和扶持力度，引导非政府组织的健康发展，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使之更好地发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倡行中的推动作用。

规范大众传媒，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效应。欧美国家通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现代媒介宣传资本主义价值观，尤其是美国通过“美国之音”、“全球传播办公室”等传媒窗口向全世界强力输送其社会核心价值观，这种媒介载体在传播社会核心价值观上所取得的效果值得我们反思。当前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众传媒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动下，出现媒体内容庸俗、媚俗等低级甚至导向错误等问题，导致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过程中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主渠道作用。显然，规范大众传媒的运行，祛媚除俗，是发挥大众传媒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功能的必要前提。

通过灌输、渗透和实践习练、养成等多种路径，全方位全过程融入国民教育。欧美国家推进社会核心价值观在青少年群体中的传播和普及，增强认同，主要借助学校教育途径，有些国家像上文提到的英国等政府甚至直接制定统一的价值观教育标准和管理措施。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更要抓住干部和青少年两个重点。

加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宪”并完善相关法制保障。要在十八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4 字表述方案基础上，在实践中继续征求意见，不断加以完善，最终在国家层面概括提炼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内涵丰富深邃、形象鲜明生动、文字易记易循的主题词或概述语方案，在广泛调研、征询基础上最大限度地达成全社会共识，并使之尽快“入宪”，取得国家根本大法的支撑。另外，要确保法律、法规、政策的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借助其权威来保障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据陈延斌、牛绍娜：《欧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 年 3 月）

■ 阎云翔：当代青年是否缺乏理想主义

真正理想境界的青年理想主义，就是要具有牺牲精神，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体利益，以追求更大的目标。我认为，这样的观点，在当前已经失去了现实针对性。实用主义的孩子缘自父母。现在父母和子女的冲突是什么？全是钱财的问题，价值观上没冲突。从人生理想和人生意义的角度来看，当代青年和父母一代没区别。这个没有代际冲突的理想，恰恰是实用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结合。50 后、60 后这一代在童年的时候受苦受穷，在物质上特别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的物质主义倾向，更多地集中在不遗余力地积累和追求财富上。而 80 后、90 后的物质主义，更多体现在消费方面。热衷于财富积累的父母一代似乎并不比沉浸于消费享乐之中的青年一代更有理想主义。缺乏理想主义的父母怎么会教育出有理想的青年？

追逐成功是因为失败的代价太大。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扁平化、单一化，整个社会就一个理想，即成为亿万富翁或者高官。而这一理想无疑追求的是金字塔的顶尖，这意味着最小的可能性成为了所有人的生活理想，结果就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人们在经济上不平等，在社会资源占有上也不平等，但是在精神价值层面上，作为一个生命、一个人，是平等的。我觉得这个尊严感很重要，人的尊严感是要靠社会制度来维系的。如果在个体尊严这一点上能够达到基本的保障，人们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去一定要做自己做不到的事，非挤到那个金字塔尖上面去。

个体化是良善社会的契机。在 80 后、90 后的青年一代身上还有很多闪光的东西——新的价值观、新的道德行为，即我是个体，你也是个体，我们之间是平等的，应该互相尊重。这些东西是无法用旧的视角来理解的。“个体化”的积极作用就在于打破了过去以牺牲个体为基础的传统格局。那个格局否认个体的主体性，否认个体意义的正当性，要求个体为集体做牺牲。从制度角度来说，过去的制度是很难调动个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所以为了适应新的市场竞争，我们要激励个体主体性，使他们主动成为有创造性的生产者。

良善不是说没有社会矛盾，不是说和谐社会不出事，而是说大家觉得有安全感，不必提防别人或者担心会受到伤害。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对食品安全问题这么关注。因为食品安全最容易让绝大多数人有受伤害的感觉，受了伤害之后，就很难保持良善。建设一个现代的良善社会的前提是保证个体的主体性和选择自由。主体性、自由选择跟自私自利不是永远绑在一起的，我们可以做到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又不伤害他人的权利，这是最基本的条件。同时也需要制度、文化的转型，需要公信力的提高，关键是需要每个个体的参与，因为这个东西很难靠自上而下地压下来，压下来就是没有个体主体性的社会秩序，依旧不会持久。在这个意义上讲，80 后、90 后的青年一代中的新价值观和新道德行为方式恰恰昭示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的理想。

（据阎云翔：《当代青年是否缺乏理想主义》，《文化纵横》，2014 年 5 月）

■ 赵云泽：微信舆论特点及其带来的监管挑战

微信的传播模式对传统的舆论监管方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通过渠道监控内容的传统治理模式已被颠覆。以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介在传播渠道上是“私密的”(手机渠道)。而基于“私人关系”(手机通讯录)和“私人空间”(QQ 朋友)发展起来的新媒介场域，政府从一开始就是缺席的。基于移动互联网产生的自媒体，仅从数量上说也是无法监控的“大数据”。其次，舆论内容的监控也更加困难。此外，微信传播的渗透率更高。现实生活中，我们对于人群的价值观影响及监控主要是基于职业和机构而进行的，但在微信关系中，撕裂了现实社会的职业疆界，重新组织起一种黏性很强的关系网络。因此，以往政府通过组织的形式进行价值观引导，将在这里失效。

为了应对这种变化，我们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应建立起社会公共讨论的社会结构，使“看不见的舆论”重新看得见。应该继续完善在互联网上的政府信息发布机制、舆情反馈机制，完善政务微博的功能。同时，要注意避免只是将网络空间作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领域”的意识，并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干预网络意见发表的做法，避免使群众意见逃离到更加私密的媒介渠道中。第二，应加强主流媒体“批判的武器”的力量，树立媒介公信力，增强社会共识和凝聚力。未来阅读的内容不仅仅是“碎片化的”，而且是“深度的”，这和人们用来阅读的“碎片化的”时间是不矛盾的。从舆论引导的层面来讲，这实际上对主流媒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主流媒体提供符合时代精神的真正精品内容。第三，应建立科学的基于微信的舆情监测体系，实现对微信舆情的实时掌握。第四，应建立政党及政府官员的形象评估、管理团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传播适合新媒介特点的鲜活内容。亲民、平等的领袖及官员形象往往会成为新媒体青睐的传播对象，这种形象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据赵云泽：《微信舆论特点及其带来的监管挑战》，《红旗文稿》，2014 年 5 月）

5. 海外视野

■ 巴黎：让市民觉得城市拥挤的不是城市密度

在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开发项目导致城市的网格密度越来越高。随着土地使用量的不断增加，城市拥挤问题愈发不可避免。因此也导致城市的主要功能都聚集在城市建成区。城市密度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命题：与城市的扩张相反，高密度可以节约城市的重要资源，特别是电、卫生、水以及道路。

市民常常认为城市高密度是不好的表现。而巴黎人工作室 APUR(也称为巴黎城市规划协会)的调查表明，很多被称为“密集”的社区，其实远不如城市中心密度高，但是城市中心区的生活质量往往比这些社区要高得多。因此，对密度的感知根据不同的城市街区有着显著的变化，它不是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的居民)或建成区密度(容积率)这

些简单指标所能反映的问题。

APUR 的调查显示，居民质疑其所处地区密度高低，会根据城市质量(例如建筑物的高度、建筑风格一致性、建筑物内公寓数量、周边功能多样性、绿色空间比例、公共聚集空间等)的不同而不同。很明显，生活在高层中的群体，“考虑到建筑高度的压迫性”，会认为周边的邻居数量太多了，区内过于拥挤。而实际情况是，这个区域内的容积率和外来访问率相对于其他研究区域都是非常低的。相反，那些来自建筑风格连续的社区居民，都非常享受能生活在这类识别性较高的社区里，而不觉得社区密度太高。

密度的感知受很多因素影响，它总体上会随着建筑物的单元数量的增加而增加，而会随着周边设施和服务的增加而降低。本研究证明了真实的密度显然异于经验中的密度感知，后者的密度形式取决于邻里间的城市品质：公共空间的活动、功能与人口的多样性，以及空间、建筑，乃至功能的协调性。为此，建造城市需在以下三方面做到协调一致：功能协调(位置分布)、空间协调(多种形式的道路、公共空间的向心性与整体性)及建筑协调(符合人体尺度、相同高度、具有当地特点)。

(据《巴黎研究表明让市民觉得城市不再那么拥挤的不是城市密度，而是城市质量》，徐辉译，“可持续城市与交通”微信公众号，2014 年 6 月 3 日)

■ 韩国的民族自尊如何演化为文化自尊?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两会期间谈到，韩剧之所以“走在咱们前头”，是因为其“内核和灵魂，恰恰是传统文化的升华”。他的观点虽然不能概括韩剧的全部优点，但至少精准地指出了韩国人注重在影视作品中融入传统文化基因、展示传统文化自信并致力于传播和推广传统文化的特点。

韩国传统文化保护、传播和传承走在中国前面，不是没有原因的。其中，政府和民众对文化保护高度契合，形成全民参与、官方支持的有利格局，是重要因素。在保护和传播的过程中，韩国注重保留文化遗存的原汁原味，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根据时代要求进行适度创新。另外，韩国政府建立了法制化、体系化和制度化的传统文化保护机制。早在 1962 年，韩国政府就颁布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文化财”即指汉语中的“文化遗产”)，多年来形成了以“文化财委员会”为核心、以文化观光部下属的文化财厅为行政管理架构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不仅政府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各种社会组织、学者和普通民众也乐于参与其中。在韩国各类文化遗产的发现、申报和推广过程中，民俗学者都表现得十分活跃。

一个国家的文化高度，决定了这个国家公民的精神高度、生存高度。文化自觉、自由是深化中国发展内涵的必由之路，是改善中国公民生存质量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传播在内的文化建设，是事关公民福祉的关键因素。正因如此，反思中韩在此领域的歧异，并从加强人类基本关怀的精神维度，着力推进中国传统文化观和文化体制转型，是打造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保持中华民族精神活力的重要源泉。

(据丁咚：《韩国的民族自尊如何演化为文化自尊?》，《同舟共进》，2014 年第 6 期)

6. 研究院之声

■ 我院召开“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学术研讨会

5 月 8 日至 9 日，我院与《文艺研究》杂志社、首都师范大学科德学院联合召开“微时代的文化与艺术”学术研讨会。来自文学、美学、文化研究、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学科的 80 余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人民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多家媒体对会议进行了报道。

开幕式由我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主持。首都师范大学纪委书记潘亮、《文艺研究》杂志社副主编陈剑澜、科德学院院长王万良分别致辞。南京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周宪、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智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电影所所长刘汉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毛崇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我院微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汪民安为大会做主题发言。

本次研讨会具有年轻学者多、学科跨度大、学术观点新等特点，在为期两天的十场分论坛中，与会学者就大视野中的微文化、微时代的微媒体、微时代的微文艺、微时代的微电影、微时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微时代的审美思考、微消费与微生活、微时代的亚文化等论题各抒己见，讨论热烈。在闭幕式上，陈剑澜将本次研讨会的成果总结为四个方面：建构微时代的概念体系、剖析微表达的社会意义、阐释微时代的美学理解、展望微政治的民主前景。

■ 我院重大项目成果《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出版

近日，我院重大项目成果《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社会主义与大众文化》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是我院 2012 年度重大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当代大众文化价值观研究”的最终成果，被列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主题出版重点选题”，由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课题由我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陶东风教授主持，本院研究人员符鹏、盖琪、蒋璐以及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和磊(山东师范大学)、胡谱忠(首都师范大学)、赵勇(北京师范大学)、周志强(南开大学)、胡疆锋(首都师范大学)等学者参与研究。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立足当下中国社会主义语境，参照西方国家的大众文化理论与实践，全面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理论的发展演变历程，从价值观角度详细论述了大众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文化核心价值观同大众文化达成融合的可能性和具体路径。本书还结合“主旋律”电影、家庭伦理题材影视剧、青年亚文化、红色经典重拍、工人阶级叙事、英雄人物塑造等文化现象，对五四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与大众消费文化的冲突和融

合，进行了尽可能系统的分析，集中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在当前大众消费时代所遭遇的“红色空壳化”等困境，并提出了相应的应对策略。

（本期摘编人：朱楠、郭云娇）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　邱运华
执行编辑：陈国战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100089
电子信箱：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010)68903449、68903576

(内部参考)